

「資本論」百年論定

陳裕書

「資本論」第一卷出版以來，今年適滿一百週年。在此整整一個世紀之中，人類思想激盪，若干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，會有亘古未有的劇變。億萬的人羣，在鐮刀斧頭的旗幟下，或則死於非命，或則慘被奴役，淪入萬劫不復的深淵。這是時代的悲劇，這也是人類空前的浩劫。如果說聖經是基督教救世的寶典，曾經譯成一百種文字，銷數僅次於聖經的「資本論」，則是危害人羣最深最鉅的邪書，這部邪書的影響，由於人類理性的普遍覺醒，現在已成近黃昏的夕陽，其迴光返照的掙扎，決無持久的可能。

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清晨兩時左右，馬克斯在倫敦貧民區蘇胡（Soho）的寓所中，核定「資本論」第一卷的最後一頁，擲筆長嘆良久，然後致函恩格斯，感謝其新近收到之十五英鎊的匯款，他說若無閣下的慷慨濟助，「資本論」第一卷，將永無問世之日，馬克斯當時撰寫「資本論」的心緒與情景，便可於此見之。他自一八四八年，與恩格斯聯合發表「共產黨宣言」，並在奧地利、德國和法國等地發動革命，先後失敗之後，一八四九年，就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，流亡倫敦，長達三十四年之久。在此三十四年的悠長歲月裡，他始終是在貧病交困之中，一家六口，初寓查爾施亞區（Chelsea），惟為欠租與避債，先後遷徙住所，計有七次之多。當時他所賴以為生的，除了恩格斯不時的周濟之外，便是為紐約論壇報（後易名紐約先鋒論壇報，今春已停刊）撰稿，每篇兩英鎊的稿費，因此全家負債累積，衣物典當幾盡，馬克斯常是整日臥床不起，藉此減輕饑寒的痛苦。但一有機會，他便關在大英博物院的閱覽室中，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，遍覽羣書，根據其主觀的論點，搜集有關的參考資料，編撰歸納而成他的「資本論」。

所以「資本論」雖被世界共產黨徒，視為「革命理論」的經典，實際並

非運用科學方法撰寫而成的學術著作。馬克斯是先有主觀論點，這些論點，原已散見於「共產黨宣言」，「政治經濟學批判」（一八五九年出版）各書之中，資本論僅係集其「大成」，加以系統化而已。他編撰「資本論」的動機，研究經濟思想史的學者，言人人殊，莫衷一是，然其自己生活遭際的慘苦，及其對於工業化初期社會，特別是紡織業中心曼徹斯特社會的不滿，因而對人羣社會發生強烈的仇恨情緒，圖謀將之摧毀改造，應是一個重要原因，而達爾文的「物種原始」，早於「資本論」八年在倫敦出版，達爾文倡導「物競天擇，優勝劣敗」的理論，馬克斯難免受其影響，認為人類的社會，也難逃「優勝劣敗」的定律，乃將社會嚴分階級，主張鬥爭，用鬥爭的手段，消滅資產階級，造成無產階級獨裁的新社會。實則達爾文的理論，僅是生物世界中進化的定律，人為萬物之靈，人類的社會，有歷史的關係，有文化的傳統，更有人羣獨有的靈性，何可與生物的世界，同日而語？

資本論共有三卷，第一卷為馬克斯的手筆，也是資本論的骨幹所在，第二卷一八八五年出版，第三卷則係一八九四年發行，均係恩格斯編述，恩格斯如同馬克斯，皆是猶太種的德國人，但恩格斯是屬於「資產階級」，乃父為德國紡織業的鉅商，在德國的瓦特伯利亞（Westphalia）與英國之曼徹斯特（Manchester），皆有相當規模之紡織廠，馬克斯後半生的生活，幾乎全由恩格斯支持。恩格斯於一八四二即結識馬克斯，彼此志同道合，終成莫逆，馬克斯撰寫「資本論」的許多背景資料，即由恩格斯供給。恩格斯負責管理曼徹斯特城的一個紗廠，他親眼看到紡織工人生活的慘苦，他們每日工作十五小時，所得工資，僅足維持起碼的生活，女工就在懷孕期間，也得

作與生活環境，廠家爲求最大的利潤，加速資本的累積，當然不願在廠房設備與衛生上，多所耗費，一般工人則因工資微薄，難求溫飽，常是一家五六口，擠住一間小房中，小說家威爾遜(Edmond Wilson)，描述當時曼徹斯特工人的生活情形，說是有如殘垣斷壁中的一羣老鼠！

馬克斯、恩格斯對於工業資本主義初期社會的痛恨，不可言喻。由此強烈的痛恨心出發，馬克斯斷言，惟有運用階級鬥爭的手段，才能改變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(Subsystem)，經濟結構改變了，其他上層的結構或建築(Superstructure)，如政治制度等，方能隨之改變。他認爲經濟或物質，乃是歷史的重心，階級鬥爭則是社會進化的動力，依循階級鬥爭的途徑，始可摧毀「人剝削人」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，然後經過無產階級獨裁的過渡，演進而成爲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」之無產階級的新社會。此種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策略，就是馬克斯理論的兩大支柱，而馬克斯之所以仇視資產階級，必欲將之消滅而後快者，實因其確信，資本家除了剝削勞動者的「剩餘價值」外，別無其他的作用，是社會的寄生蟲！馬克斯認爲，生產品的價值，等於工人製造該項生產品的勞動價值，但資本家償付工人的工資，却只有此種勞動價值的一小部份，剩餘的部份，資本家留爲利潤，這種利潤，就是馬克斯所稱的「剩餘價值」(Surplus Value)。資本家爲求增加其「剩餘價值」，勢必繼續和擴大剝削生產的工人，且因資本家控制生產的工具和國家的政權，此種資本家剝削工人，藉以爭取「剩餘價值」的關係，自無止境，推演所及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，儼然對立，結果階級的鬥爭，一如希臘羅馬奴隸社會中之自由人與奴隸，封建社會中之地主與農奴的鬥爭，便成歷史的必然(Historically Inevitable)。

馬克斯不獨認爲，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必然，他甚且確信，資本主義和資本家，也是他們自己的掘墓人，終必將他們自己埋葬！因爲馬克斯認定，資本主義的制度，是依循三種經濟紀律而運行的，第一、資本家爲求增加其剩餘價值，加速其資本的累積(Capital Accumulation)，必須引用機器，大量生產，加強競爭，但因機器代替了部份的工人，競爭不能不削價傾銷，於是資本家所得之「剩餘價值」，反因大量生產與激烈競爭而逐漸減少。第二、由於資本家利潤或剩餘價值的逐漸減少，若干資力薄弱的資本家，在激烈競爭的過程中，便非破產不可，結果就是資本集中(Concentration of Capital)現象的形成，資本一告集中，資本主義的制度，當然流爲托拉斯獨佔與壟斷的局勢，資本與工商業，集中於極少數資本家的手中。第三、資本的大量集中，與工商業的獨佔與壟斷，終必造成經濟危機的循環，於是「無產階級革命」的時機，便告成熟。依據馬克斯的邏輯，這也就是資本家自掘墳墓了。資本家進入墳墓之後，「人剝削人」的現象，與社會上「有」與「無」階級的分野，從此消除，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，國家亦將隨之消失(Wither Away)，一個人類歷史的新頁，就將自是揭開。

「資本論」第一卷發表之後，人類的歷史，確實揭開了一個新頁，但這一新頁中，到處是血腥，充滿着人類的滔天悲劇。馬克斯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抨擊，原與工業革命初期，若干宗教家社會改革家爲改善工人生活，爲打破社會不平等提出之「道義的抗議運動」(Moral Protest Movement)，並無重大的差異，只是馬克斯所求的，不是社會的改革，而是社會的「翻身」，馬克斯認定，他自己的理論，乃是一種科學的社會主義，這種社會主義的實現，則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。馬克斯這種堅定的自信，原也是符合西方社會中所謂人類歷史總是向前與向上發展(On An Onward and Upward Path)的傳統，惟因馬克斯個人生活遭際的慘苦，與其對於工業社會初期的憤懣，以致遷怒全人類，對人類具有濃厚的仇恨心；他雖然鼓動無產階級翻身專政，實則他要無產階級流血犧牲，也何嘗對他們真心關愛呢？所以他始終是在憤怒的情緒與理性不平衡的狀態中，撰寫「資本論」，其文字與內容，尖銳潑辣而具煽動性，但其唯物論一元的主張，對於歷史發展的實際，社會進化的動力，多是蒙昧無知，以致形成爲人類歷史上最醜惡的一種急進主義。

約莫二十年之前，我曾在學校中選讀「經濟分析」(Economic Analysis)一課，我們所用的課本是英儒馬素爾(F. Marshall)所著的「經濟學原理」，「資本論」也列爲參考書之一，我當時翻閱「資本論」的一種直覽，就是認爲馬克斯顯然誤以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，乃是一物之兩面，並無不同，資本主義固然必歸消滅，民主政治也是無可救藥，只有趨於潰亡，因爲資本主義是下層建築，民主的政治，則是上層建築，上層建築必然隨着下層建築而轉變而瓦解覆沒，他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政治，特別是工業國家的「巴力門」，不過是資本家的「執行委員會」，僅爲維護和伸張資本家的利益

益而存在，決不會圖謀社會的革新與工人生活的改進。我現在仍然以為，馬克斯理論的一個主要偏差，就是他基於經濟決定的宿命論，不信民主政治程序的運用，可以逐漸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，而為最多數的人民謀求最大的福利。事實上，過去一世紀中，民主政治或議會政治的適當運用，已使資本主義的面目全非。反托拉斯法的通過，防止了資本的過份集中，工商業的壟斷現象，漸成陳跡；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的徵收，步步拉平了貧富的分野；公司法和股票交易法的實施，幾使任何人皆得為公司的股東，也就是所謂的資本家；勞工法律制訂之後，罷工是工人的「天賦權利」，所謂「集體交涉」（Collective Bargaining），更是勞工們達成其目的的有效手段；工會的組織，則是今日民主社會中威力無邊的機構，資本家和政客，對之莫不側目而視。而民主政府財政金融政策的適度運用，與社會安全立法的週密完善，也使馬克斯預言的經濟週期性危機，並無任何的嚴重性；工人生活的安全，獲得充份的保障，階級鬥爭對他們便喪失了原來的意義。農民在馬克斯的理論中，並不應有的重視，但在民主的制度下，特別是在我國土地改革之後，農民是耕者有其田，是獨立的生產者，是其生產成果的獨立支配者，這與共產社會「集體農場」或「人民公社」中的農奴，真有天壤之別。凡此可知，民主政治適切與合理的運用，業已一方面揚棄資本主義中的腐惡成份，另一方面發揮資本主義的優越因素，所以美國前任總統艾森豪，曾謂美國當前的資本主義，乃是「民衆資本主義」（Peoples Capitalism），以示其有別於亞當·斯密的資本主義。這種所謂上層建築（民主政治），居然可以影響並改變下層建築（資本主義經濟）的事實，決非馬克斯始料之所及。

馬克斯之以物質為歷史重心的唯物史觀，其不能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，就可於此見之。但歷史的重心，也非全為精神、精神和物質，同為人類生存之所必需，所以人類生存或民生問題，才是歷史的重心。人類生存的促進，與社會進化的動力，又決非階級的鬥爭，而是階級或社會全體利益的調和，目前自由國家中經濟的繁榮，社會的進步，與人民的康樂，可為明證。馬克斯確定階級鬥爭原則的理論根據，不一而足，但其「剩餘價值」的理論，自是一個重要的促成因素。馬克斯既然認定生產品的價值，等於工人製造該項生產品的勞動價值，資本家為求利潤，唯有剝削工人的勞動價值，易言之，資本家的「剩餘價值」，純出自工人身上，工人為求避免「剩餘價值」

之被剝削，便當然要出之以階級鬥爭了。所謂「剩餘價值」說，乃是「資本論」第一卷中的骨幹理論，這種理論的無稽，現在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，莫不知之。一種生產品的形成，工人的勞動力，固是一個重要的構成部份，但決不是唯一的部份，生產的過程，至為複雜，生產的因素，亦非簡單，勞動力不過是此種複雜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。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高爾布萊（J.K. Galbraith）會謂，當前工業中舉足輕重的人員，不是大股東總經理，也不是一般工人，而是科學家和高度技術人員（見其所著New Industrial State一書），此在運用自動機械的工業，尤是如此，馬克斯「剩餘價值」理論之缺乏客觀的價值，現在尤是顯明，所以「資本論」的理論與教條，在今日進一步的人類社會中，實無立足的餘地。而在共產社會中，「資本論」特別是「剩餘價值」說，則已成其經濟發展的主要桎梏，因為馬克斯的徒子徒孫，拘泥於「剩餘價值」之說，注其全力於勞工問題，對於工業生產與發展的其他因素，一概忽略，致使共產的社會，包括蘇俄在內，工業始終落後，經濟迄難起飛；農業亦然，以蘇俄之廣土眾民，「十月革命」五十年之後，其農業的生產，仍然無法維持其人民的溫飽，每年皆向加拿大澳洲等國，購買小麥，以足民食，他無論矣。這種鐵一般的客觀事實，漸使蘇俄及其東南歐的附庸國家，不得不逐漸擺脫馬克斯理論的桎梏，而逐漸修正其經濟的制度，接受資本主義的若干法則，現在歐洲地區共產國家的經濟，大多均已採取利潤制度，和增加農民的自耕地，美國駐俄大使柯勒說，羅馬尼亞農民的自耕地，計佔農地百份之八十，集體農場只有百份之二十。據估計蘇俄的工業，現在採用利潤制度者，已有百份之三十以上，九月二十二日「時代週刊」報導，東德共產頭目烏布萊支紀念「資本論」百周年的致辭，是在解釋東德現在何以也採用了利潤制度！利潤就是馬克斯所謂的「剩餘價值」，這豈非等於共產黨也要向工人攫取「剩餘價值」，馬克斯理論的澈底破產，如今真是暴露無餘了，難怪西方的智識份子，現在對於馬克斯恩格斯的著作，莫不視若敝履，不予理睬，「資本論」實已完全喪失其本來的煽動性與影響力。去夏我旅行西歐，途過倫敦，會僱車探訪馬克斯紀念圖書館，但司機不明這個圖書館究竟在何處？詢之警察和路人，也無人知之，後來打聽馬克斯紀念圖書館，係在倫敦的愛斯林敦區（Islington District），收集馬克斯以及有關馬克斯的著作四萬冊，惟因會員減少，經費無着，早成半關閉的狀態。工黨控制

的愛斯林敦區政府，且曾擬議將其拆除，保守黨掌握的大倫敦市政會，則認其具有歷史價值，決定予以維持。馬克斯紀念圖書館，竟要依賴篤信資本主義的保守黨，加以維護，可見馬克斯「資本論」發表百年之後，目前僅有歷史的價值，實是不言可喻了。

國父中山先生四十餘年前出版的三民主義，早已點破「資本論」基本理論的錯失，現在「資本論」的澈底破產，共產國家間思想與政策的分裂與轉變，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修正，在在顯示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，確為較能適應進步社會需要的經濟制度，今日西方國家經濟的適度計劃，政府財政政策的運用，與乎社會福利的種種措施，核與民生主義的主張，儘多類似之處。記得一九四七年間，紐約部份學人集會慶祝 國父誕辰，「社會史觀」（

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）的作者威廉（Maurice William）亦在座，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查特瓦爾（James Shortwell）致辭並指出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，其對社會科學的重要性，不下於愛因斯坦「相對論」之對自然科學的重要性，實具真知灼見。第1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[二十]一年來民族主義思潮的澎湃，民主政治慾求的強烈，以及民生改善，社會福利措施的普遍，處處證明三民主義始終把握時代的主流。「資本論」的世紀，業已壽終正寢，若干共產黨徒的掙扎，充其量只是迴光返照而已，人類理性的普遍覺醒，終使一個以民族民權與民生為思想主流的新世紀，正在順利展開之中。

蘇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背景與目的分析

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廿五次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

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十四日上午九時，在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會議室舉行第二十五次學術座談會，討論「蘇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背景與目的」。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鄧公玄教授主持，出席參加者有（以簽名為序）：趙先運、關素質、呂律施、岳、王啓升、尹慶耀、嚴靈峰、馮達、孫桂籍、郭乾輝、鄭學稼、鄒宇光、魏守嶽、丁慰慈、曹敏、李邁先、任卓宣、周鑫、李界平、畢英賢等三十餘人，並承記者多人與會採訪，茲按當日發言先後，將要點刊載於後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主席報告

個會由本人代他主持。

今天座談會的題目是「蘇俄紀念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背景與目的的分析」。在座被邀請的專家學者都是對蘇俄問題有